

“双一流”建设动态



2020年第5期（总第四十六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展规划部编

2020年5月15日

目 录

【“双一流”建设】	1
加快推进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建好这五个体系.....	1
“双一流”的隐义：一流高等教育体系建设.....	4
文化自信在“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研究.....	11
【高教热点】	15
近四年全国高校撤销近1600个学位点，这个学科几乎每年都是“第一”.....	15
强基计划深度解析：多所“双一流”高校拿出王牌专业.....	18
过度推崇SSCI论文，这股风气应当警惕.....	21

【教师与教育】	23
大学教学改革新思维和新方向.....	23
大学课程中“水课”现象审视与“金课”建设进路.....	26
【国际动态】	32
德国“卓越计划”对“双一流”建设机制的镜鉴.....	32
美国本科生科研核心能力图景、培育路径及其启示.....	40
大学治理：美国、欧洲、中国.....	48
【同类高校】	54
中国人民大学获10项“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重点项目.....	54
上海财经大学入选首批国家经济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	55
【本校动态】	56
携“宝典”走四方——我校法学院学者积极宣传民法典.....	56
中南大.建行大学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挂牌成立.....	58

【“双一流”建设】

加快推进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建好这五个体系

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立足高等教育由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跨越的新起点，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需要，我们必须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快推进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

1、完善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的一体化育人体系

立德树人仍然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高校的立身之本，是办好中国特色高水平大学的核心理念，是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有效落实这个根本任务，需要我们坚决贯彻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思想理念，构建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相统一、校内教育和校外培养相协同的一体化育人体系。

在大学阶段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该解决大中小学德育教育衔接不紧密的突出问题，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中“五育”割裂化的突出问题。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立德树人绝不仅仅停留在德育课程的讲授上，而是应该渗透到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诸多方面中。要明确所有教师都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德育的要求贯穿到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之中，加强学校德智体美劳教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大力构建以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等为依托，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形成强大育人合力的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在大学阶段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该解决长期存在的学校教

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不协同的突出问题。统筹发挥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的育人资源。只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互协同，才能形成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强大合力。

2、夯实以服务需求为特色的学科专业体系

在高等教育整个体系中，各高校应该立足本校实际，紧紧围绕国家和社会需要，设置科学合理的学科专业体系，这是解决高等教育供给与需求这一结构性矛盾的迫切需求。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类型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已经从相对单一的结构向多元多样化办学结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的关键是要建设好与本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群，压缩“平原”，多建“高峰”，避免赶速度、铺摊子、求规模。尤其要把学校传统的优势学科专业做强，把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做精，把新兴交叉融合的学科专业做实。

实际上，“特色+优势+一流”，才是真正的一流，才是持久的一流。在具体操作上，要不断强化学科专业高点，培育学科专业重点，扶持学科专业增长点。另外，要针对高校学科专业上的盲目布点、重复设置，“多而散”的功利性现象，必须痛下决心建立预警机制，把就业状况反馈到人才培养环节上来，引导高校科学合理设置学科专业，统筹好学科专业的存量升级、增量优化、余量消减工作。

3、形成以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分类办学体系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既有研究型大学，又有应用型大学，还有职业技术型院校。我们的各级各类高校要在不同地区、层次、领域内办出特色，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把多样化、有特色、服务需求作为高校发展的战略选择，实现高校的错位发展、内涵式发展，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格局。

在学校层次类型上，不能盲目攀高，一味追求学术型、综合型，要形

成梯度、对接需求。要从“金字塔”转向“五指山”，既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也要发展应用型大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要追求卓越、办出特色，实现高校差异化发展。特别是，要针对不同类型层次高校的办学特点和资源需求，形成分类评价的体系标准和管理政策，建立不同类型高校的经费投入、人事管理、质量评估、监测评价制度，逐步构建起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分类办学体系。

4、构建以质量贡献为导向的教育评价体系

要认真践行重师德师风、重真才实学、重质量贡献的价值导向，构建以质量贡献为导向的教育评价体系，应重点把握好四个方面：

一是培养一流人才，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首要标准。大学应该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二是产出一流成果，把对国家的贡献度和国内外公认度作为重要考量。大学的成果应该表现为破解世界科技前沿难题、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回答解决区域行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等多种形式。三是发挥一流影响，把形成的重大影响力作为最高评价。大学的影响源自大学文化的沉淀和积累，表现为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趋势的引领。四是办好一流本科，把一流本科教育作为立校之基。大学的本科教育应该在领导精力、师资力量、资源投入等方面具备充足的保障。

建设“双一流”，不能唯国际排名论英雄、论成败，关键是要解决好国家和民族面临的时代问题。世界上名声赫赫的大学，都是因为优秀人才培养和卓越学术成果积淀而得到公认的，没有哪一所是通过排名排出来的。

5、坚持以党的领导为统领的内部治理体系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要构建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以职能部门和专业院系为依托，以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理事会等为支撑的现代化大学内部治理体系。

首先，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增强政治引领力。在

这一体制运行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把握好“集体领导、科学决策、分工负责”这三个关键点。其次，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各个院系和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形成高效、协调、顺畅的运行机制。再次，要学习借鉴国内外办学治校先进经验，把学校的学术组织和群团组织作用发挥好，创造良好的办学生态环境。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既相对分离，又相互促进，形成相得益彰的良好工作机制。

（摘编自光明微教育 2020 年 4 月 8 日，作者：杜玉波）

“双一流”的隐义：一流高等教育体系建设

将“双一流”建设战略置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框架中考察，有必要重视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与其所置身的一流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之间的依存关系，以克服过于强调战略重点可能导致的对全局的忽视或轻视。在新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方位上，以“双一流”建设首阶段的实践为基点，有必要坚持教育综合改革和教育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思路，明确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与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同步建设，克服“双一流”建设行动中可能出现的“突出战略重点、忽视系统全局”的认识和实践偏差，寻求“重点促进全局，全局保障重点”的整体发展态势，进而更有效地实现“双一流”政策的预期目标。

一、对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理论认识

高等教育哲学是指导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引。高等教育“认知论”趋向于以“悠闲的好奇”这种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来达致追求知识这一终极目标，而高等教育“政治论”则强调高等教育在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的基础上担负起诸多公共服务职能。这两种貌似冲突的高等教育发展路向，却完美地统一于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中。受其实用主义思想和市场化制度环境的影响，美国高等教育呈现出高度多元化的发

展样态，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并存。针对普及化时代传统精英高等教育和现实大众高等教育之间的可能冲突，布鲁贝克的立场更倾向于让二者并行发展。

在同一时期，马丁·特罗提出了著名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量与质相统一的概念，量的增长指的是适龄青年高等学校入学率达到 15%-50%；质的变化则包括高等教育理念的改变，学校类型与规模，乃至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的变化。特罗强调，成功实现高等教育政策多样性的关键是鼓励教育提供多样的结构和功能，该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伯顿·克拉克则用国际比较的方式考察了高等教育系统。其结论是，无论哪里，高等教育的工作都按学科和院校组成两个基本的纵横交叉的模式，这是高等教育系统保持组织弹性和发挥多重功能的组织基础。而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的知识材料，则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历史地看，正是知识内容、类型及功能的扩展，内在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演变。

无论如何，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已超越精英教育时代传统单一的“大学教育”定位和形式，演变为更为复杂、多元的“中学后教育”，其体系包含多种不同的高等教育类型、教育机构、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具有多重功能。深入分析，人们常常谈论的所谓“美国大学的优异”，并非指几个顶尖大学的水平，而是美国大学体系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体系都要先进。其多元、灵活的大学体制，保证了美国的高等教育能为各个阶层的人在人生、事业的各个阶段提供教育服务，并且促成了多种体制的竞争，使任何一个体制都不可能高枕无忧。对于这种多元成分的高等教育系统，其不同层次与水平的合理组合，是高质量教育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结构性优势的具体表现。

在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均已发生深刻的变化。精英高等教育、大众高等教育乃至高等职业教育，均源自受教育者和经济社会的多样化需求，彼此互补。位于系统顶端的精英高等教育，通常关系国家或区域人才、科技与文化的实力和竞争力，故更容易获得国家性的共识。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有机体系，其内部不同板块之间维持某种相对均衡的发展，形成系统整体的最优状态。就此而论，不仅要强调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性，还要强调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性。

二、“双一流”建设政策的深层解读与实践反思

对“双一流”建设政策的分析和理解，需要适度超越政策文本及其显性内涵，触及深层的政策逻辑与隐性目标。

1. “双一流”建设所置身的改革框架和政策语境

“双一流”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处在新方位的背景下提出高等教育发展新战略，应置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框架中来把握。

研读《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政策文本，“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被确定为“双一流”建设所寄予的核心政策目标，其所承载的更上位的政治目标则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无论是建成高等教育强国还是助推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需要与高等教育强国地位相称、足以支撑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一流大学甚至一流大学群。对于“双一流”战略，我们不仅要关注入选院校和学科的“创一流”，还应关注“双一流”建设所寄望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

将“双一流”建设置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时空中看，置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框架中看，“双一流”建设无疑是我国高等教育在经历“大改革、大发展”

之后迎来的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新时期的重大改革举措，也是推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教育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之一，其政策导向仍是在坚持重点建设的同时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对“双一流”重点建设政策，还应同中央政府重点负责管理少量全国性重点大学的高等教育行政职能关联起来，不宜将其过度解读为“只顾重点而不顾全局”。

站在高等教育事业的全局来看“双一流”，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无疑是包括“双一流”板块在内的一流高等教育体系。没有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国家难以成为真正的高等教育强国，难以有力支撑民族的伟大复兴。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有机体系，没有底层和中层的坚实支撑，位于系统顶端的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发展也会遭遇“基础不牢”的系统风险。因此，国内高等教育界主张，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已居全球首位的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应放在高等教育的体系建设和内涵发展上，要努力促进体系内每所学校的卓越发展，因为它们是高等教育质量的载体。

2. 地方“双一流”建设的实践反思

如果说国家层面的“双一流”建设相对好把握，那么地方的“双一流”建设显然更加复杂，因为各地的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平衡。无论是各地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基础与现实格局，还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实际需求，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意味着，地方的“双一流”建设，固然应当同中央的政策保持某种一致，却不可不考虑地方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并在政策目标、政策重心与政策措施等方面保持必要差别与恰当调整，因地制宜。从各地的“双一流”建设政策文本看，各省市的建设思路、方案与举措，基本上与中央版“双一流”政策差别不大，对地方高等教育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考虑不够充分。这种路向极可能会加剧

区域高教体系内部差序分化、加剧系统内校际竞争的“马太效应”，干扰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发展，冲击地方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以地方政府的坐标来看，不宜忽视国家“双一流”政策的战略定位及其隐含的政策导向，不能轻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一流区域高等教育体系的多元需求。中央“双一流”建设战略传递给地方政府的政策信号，应当理解为：对列入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重点院校和学科给予全面支持，同时根据地方发展需要制定地方重点发展的区域高水平院校和高水平学科，并通过国家和地方两个层次的“双一流”建设的示范效应与带动作用，引导未进入“双一流”建设的其他高校和学科正确定位、特色发展。

在当下“双一流”建设风头强劲的态势下，被纳入中央或地方“双一流”建设范围的高校和学科不仅能获得更为充裕的资金支持，而且能获得学校或学科声誉上的显著增益，并据此享受各种溢出性隐性政策红利。其结果往往是，客观上加剧了全国范围内欠发达省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洼地困境”和省域高等教育系统内校际竞争的马太效应，因为高等教育中机构等级的惯性的基本效应就是这种滚雪球效应。不可忽视的是，如同早些年因“211工程”“985工程”而催生的社会对“非211”“非985”院校毕业生的“门户歧视”一样，“双一流”建设很容易诱发社会对地方院校尤其职业院校毕业生的“门户偏见”。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之间的鸿沟长期存在甚至不断拉大，高等教育促进中低阶层向上流动的社会功能将会被削弱，从而引发新的“读书无用论”、社会阶层固化，以及强弱两极分化等一系列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超越“双一流”的一流高教体系建设构想

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意味着充分发挥政府的高等教育立法、规划、投资、评估及信息服务等教育行政职能，通过有效的市场引导和政府干预，克服高校发展过程中的“高、大、全”倾向，矫正高校“千

校一面”的不良局面，是建设国家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基础和重心。相应地，以下五个方面的改革举措应予以重视。

一是树立基于系统论和生态论的新型高等教育发展观。在此问题上，国内理论界不仅存在高等教育“适应论”与“超越论”之争，实践中更存在“重点（建设）论”与“系统（发展）论”之别。在资源约束的既定条件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点大学建设就常常成为后发国家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常规顶层设计和核心政策选项。我们在实践中常常对重点大学，尤其是重点研究型大学和“重点建设”政策设计的极度青睐，而往往疏忽于对高等教育体系和事业的整体规划、结构优化和协调发展，致使高等教育体系内部不同区域、类别和层次的高等教育板块、院校、学科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多种多样的，既需要高学位又需要大专毕业生；既需要理论型人才又需要应用型人才；既需要研究型人才又需要技能型人才，这是由产业和社会结构决定的，也是高等教育系统必须正视和回应的。因此，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切实树立一种“现代的”高等教育发展观，深刻认识和自觉遵循高等教育多元化、体系化、生态化的发展规律。

二是从国民的高质量教育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加强和落实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我国省级地方政府并不缺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动力和热情，但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的制定和落实方面，确实又是普遍的短板，迫切需要正视和补强。省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应在省级政府的整体指导性规划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支持和引导社会对高等教育运行的合理介入，来实现同类高等院校与学科之间的良性竞争，进而推动高等教育体系的提质增效。

三是完善教育投资体制机制，确保对不同高等教育板块与机构的相对均衡投资力度。长期以来，我国对教育事业的投资，既存在相对实际需求

的总量不足问题，又存在投入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应当在对高等教育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别、层次甚至科别的院校（学科）的实际办学成本和办学水平进行科学测算、评估，建立体现不同类别院校（学科）“同等国民待遇”的相对均衡的生均教育经费投入标准，以及基于实际办学水平与绩效的不同类别院校（学科）奖励性教育经费投入机制，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除生均教育经费拨款等基本教育经费投入项目外，各种专项经费投入，则应破除传统的对不同类别院校（学科）的“身份等级标准”，综合不同类别院校（学科）办学的实际需要及其办学水平的优劣来考虑。当然，建立这种新型的资源投入机制，需要在对不同院校（学科）分类管理、分类评价和院校办学、管理和评价相分离的轨道上实施。

四是建立健全对不同高等教育类型与机构的分类评价和分类管理机制。多样化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和形成，须有科学的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机制来牵引。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通常要求以多种并行的价值标准来评价不同类别的院校（学科），形成同类院校（学科）之间的声誉博弈和不同类院校（学科）之间的“各美其美”，以维系整个高教体系“和而不同”的特质。要建设多样化的一流高等教育体系，除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外，还须在管、办、评分离的格局下，建立对不同类别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的体制机制，推动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分化、同类竞争和诸类协调发展。

五是要积极营造准市场化甚至市场化的高等教育制度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属性更加突出，这意味着其生产与分配有必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考虑市场机制的作用，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必要改革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与运行机制，积极转变政府高等教育职能，营造市场化的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使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结合实际，我们有必要通过试点改革，打破基于院校类型身份的分批录取政策，赋予不同类别高等教育机构在生源竞争上的公平机会；在必要政策调控的前提下，顺应目前师资竞争的某种市场化趋势，引导师资在区域内、高校间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并据此倒逼高校内部的治理变革、管理服务和用才软环境的提升；引入绩效优先、公平竞争的经费竞争机制，推动各种财政性专项经费配置的市场化；积极引入专业的第三方评价，科学评估不同院校（学科）的办学水平，并将其同奖励性拨款相挂钩；大胆尝试借助专业中介机构，强化对各类专项建设经费投入的绩效评估甚至绩效审计，来督促高校提升办学资源的使用效能等。

结合实际，我们应着力构建和营造市场化的制度环境，辅之以必要的政府宏观调控，确立市场化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推动高校从政府的某种附属物真正转型成为开发、输送、积累人力资源的自主办学的独立法人实体，切实面向社会和市场自主办学，在市场竞争的洗礼中蜕变为真正自主、自律、自为的法人，并在竞争压力的驱动下重视自身的精确定位、战略管理、“主业”经营、质量提升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摘编自《江苏高教》2020年5月，作者：陈金圣，张晓明）

文化自信在“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研究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最具辨识度的身份标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直接影响到本国和本民族文化的兴衰浮沉。高校在引进、学习并吸收西方发达国家高校建设成功经验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保持高度的自信。

一、“双一流”大学的内涵

“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世界一流，中国特色”这一对

根本要义，坚持二者的辩证统一。

1.中国的“双一流”大学，需要体现中国特色

坚持中国特色，首先就体现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上。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校，中国高校的根本任务就在为党和国家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接班人，为实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历史使命提供人才资源和智力支持。因此作为中国高校发展序列第一层级的“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更应该在党的方针、政策引导下落实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其次，坚持中国特色，还体现在大学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上。一流大学，除了需要具有一流的科研水平，还应该需要一流文化作为支撑，中国的一流大学，其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培育，有且只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寻求价值养分。无论是优秀传统文化，还是革命文化，或者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它们都能够起到文化支撑引领作用，作为大学的精神文化建设的文化底蕴，体现出中国一流大学的鲜明底色。

2.世界的“双一流”大学，需要对标世界一流

“双一流”大学建设，实现“世界一流”标准需要做到：以一流为目标，通过资源政策的倾斜集聚发展力量，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化视野和格局的一流人才，产出达到或者赶超世界一流水平的原创性科研成果。以学科为基础，凝练学科优势，优化学科结构，突出学科特色，引导一批优势特色学科率先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从而带动高校整体学科大踏步前进；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一流学科建设来回应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关键问题，着力提升国家科技实力。以绩效为杠杆。围绕“双一流”大学建设周期，构建完善合理的评价体系，确立合理预期的“双一流”建设量化指标，确保建设实效；建立奖惩机制，规范绩效考核标准，兼顾效率与公平，

激发高校创新创造活力和内生动力，不断提高学科实力和办学水平。

二、“双一流”大学建设与文化自信的耦合关系

1.“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文化自信的支撑

高校的基本职能决定了其在“双一流”建设中需要文化自信作为支撑。首先，高校具有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的职能，高校必须在高度文化自信的价值引领下，始终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自觉以先进文化陶冶学生，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文化涵养，对社会主义文化高度自信的优秀人才，参与到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其次高校是文化教育与研究的主要阵地，作为处于中国高校优先发展序列中的“双一流”大学，肩负着传承与创新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的伟大使命，因此必须以高度文化自信，自觉弘扬社会主义优秀文化，挖掘其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双一流”大学的建设任务决定了在其建设中以文化自信作为支撑。首先，“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和《实施办法》均在文化传承创新与大学文化建设方面提出要求。由此可以看出，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不仅需要在学术科研水平上达到甚至是赶超世界一流高校，在大学文化建设方面也需要突出中国特色，而要走出一条胸怀世界，又独具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之路。

2.文化自信在“双一流”大学的文化价值取向中得到体现

新时代，高等教育正进行着新一轮发展变革，高校需要将“文化引领”“文化荣校”等作为学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战略，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师生的担当精神、使命意识和责任感，铸造一流的大学精神。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高校必须始终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重视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在改革实践中，自觉担当起践行文化自信理念的时代先锋，将文化自信的价值引领贯穿到“双一流”建设的各个环节和阶段，以文化自信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

文化和大学精神。

三、“双一流”大学建设文化自信支撑的内核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双一流”大学建设文化自信的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创造和传承下来的，它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深切的价值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作为独特的民族精神标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起了中国人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内核。

一流大学必须以一流的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作为文化支撑，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价值归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的深层基因，建设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必须有文化自信。因此，在双一流建设中，以先进理念为指导，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始终坚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走出一条具有兼具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双一流高校建设道路。

2.革命文化是“双一流”大学建设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

革命文化是“双一流”大学建设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作为在革命实践中积淀而成的宝贵精神资源，革命文化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忠诚可靠的优良品质，他们一起构成了革命文化显著的精神特质，成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文化自信的理论来源、实践之源和力量源泉，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

“双一流”建设不可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存在着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当今世界，在高等教育发展序列和国际知识体系中一直存在不平衡、不平等的现象。这既是国家出台“双一流”建设工程的重要原因，也是国家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需要直面的痛点。因此新时代，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仍然需要发挥革命文化的当代价值，以

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引领“双一流”大学建设。

3.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时代指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灵魂，是“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时代指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必须重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高校需要重视先进文化在建设过程中所起到的时代指引作用。当今世界一流高校，都是深深根植于本国本民族先进文化的沃土之中才能发展与壮大。新时代，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中开始了新的征程，同样需要与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以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引，努力提高我们高等教育办学水平，把我国高等教育建设成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世界一流高等教育。

（摘编自《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20年4月，作者：康宇、张扬）

【高教热点】

近四年全国高校撤销近1600个学位点，这个学科几乎每年都是“第一”

第五轮学科评估临近，一份高校学位点动态调整的名单再次引发热议。2019年，101所高校（单位）共撤销193个学位点，尽管数量相比往年下降较为明显，不过近四年累计来看，撤销学位点则达到1598个，大大超过了新增学位点数量。

原先高校都是以学位点数量论高低，在学位点方面多多益善。但现在

却大范围撤销部分学位点，不乏一些一级学科的硕博士点，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事实上，在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即将开展和国家“双一流”建设中期考核的背景下，高校大幅调整学位授权点，尤其不少高校主动撤销大量学位点，意味着高校的发展思路正在逐渐改变，开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的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一、短短四年，1598 个学位点被撤销

高校学位点大规模动态调整始于 2015 年。这一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中，决定自 2016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学位点的动态调整。自此，高校学位授权点“终身制”成为历史。

2016 年 10 月，全国学位点动态调整结果公布，来自 175 所高校的 576 个学位点被撤销。2017 年和 2018 年，撤销学位点数量仍然保持高位，分别有 340 个和 489 个。2019 年，尽管临近第五轮学科评估，各大高校撤销学位点的数量下降较为明显，仅有 193 个。从近四年的学位点撤销结果来看，累计撤销的学位点总数达到了 1598 个，而撤销学位点的单位数量均在 100 家以上，其中 2018 年撤销学位点涉及的单位数量最多，共有 182 所高校进行撤销。

二、哪些学科上榜“撤销榜”数量最多？

对于具体撤销的学位点名称进行统计，发现软件工程学位点撤销数量最多，四年共有 74 个学位点被撤销，几乎年年都位居撤销榜“第一”。

除了软件工程外，工程硕士（项目管理）三年共撤销学位点 61 个；应用化学、工程硕士物流工程、统计学、生态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工程硕士（工业工程）学位点撤销数量均在 25 个以上，位居第三到第七位。学位点撤销数量较多的还有科学技术哲学、仪器科学与技术、艺术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等学位点。纵观这些学科名单，不难发现，它们基本都是各个

学校办学水平不高，或是应用性较弱的学科。

三、软件工程为何被撤销？

对于撤销数量最多的软件工程来说，该学位点均为一级学科，包括 12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和 62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其中，2016 年软件工程撤销数量最多为 35 个，2017 年和 2018 年撤销数量分别为 14 和 19 个，2019 年撤销数量为 6 个。对于这些撤销学位点的单位进行分析，发现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 15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为 11 所，非双一流高校最多，达到了 48 所。

有分析人士指出，“软件工程”学位点在动态调整中被大量撤销的原因主要与学科建设历史有关。2000 年，国务院为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而在发布的《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中指出，国家教育部门要“发挥国内教育资源的优势，在现有高等院校、中等专科学校中扩大软件专业招生规模，多层次培养软件人才”。第二年，教育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便批准并大力支持 35 所高等学校试办首批示范性软件学院。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软件工程学位点数量过多，相关人才已趋于“饱和”，于是近年来各大高校开始撤销软件工程学位点。

而对于国内顶尖名校而言，撤销软件工程或许也有做大做强其他学科的考量。如果结合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上海交通大学的软件工程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被评为 A-，但在 2018 年却撤销了博士和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这是为什么？据了解，上海交通大学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即到 2050 年建成卓越的世界一流大学，学校的整体实力稳居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重点要在国家航海、制造、信息等重点建设行业和关键发展领域中确立不可替代的地位。显然，软件工程与学校的发展战略有些离散，因此为了集中精力、财力而放弃一个 A 类学科，显示出来上海交通大学的信心和决心。

同样，北京理工大学、燕山大学等高校或许也是基于同样的考量，而撤销了评估结果不错的学位点。

四、“工程硕士”同样也是撤销学科“重灾区”

在撤销的学位点中，工程硕士相关领域的学位点被大幅撤销，2016年有95个撤销，2017年撤销48个，2018年共有111个撤销，四年累计撤销254个学位点，占比达到了18%左右。其中，撤销最多的是工程硕士（工程管理）、工程硕士（物流管理）、工程硕士（工业工程）等工程硕士学位授权领域。究其原因是，这些工程硕士学位办学水平较低，有些以盈利为导向，甚至违反国家规定。在第五学科评估和“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各大高校纷纷撤销这些工程硕士点，对于这些高校的发展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只会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学科评估、发展变化的导向，学位点的调整势必将会是动态的，撤销一些弱勢的、落后的学科学位点，增列一些新兴的具有潜力学科学位点，才能在高校发展中始终前进。

（摘编自青塔4月17日，未标明作者）

强基计划深度解析：多所“双一流”高校拿出王牌专业

2020年初，强基计划正式亮相。作为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该计划旨在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与原自主招生不同，计划从选拔定位、试点学校范围、招生专业、报考条件到入围高校考核方式、录取方式及培养模式等都进行了系统性重塑。

一、谁能报：两类考生可拿“入场券”

从目前高校发布的招生简章看，大都把可以申请报名强基计划的考生

分为两类：一是综合素质优秀、高考成绩优秀的学生，二是相关学科领域具有突出才能和表现的考生。多位专家强调，强基计划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基础学科人才选拔培养计划，并非简单的招生改革。这明确体现在今年的强基计划招生中，各高校都拿出了自己的基础学科王牌专业。

值得注意的是，各校都强调，被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如对自己专业不感兴趣，最多只能换到该校同一专业（专业类）的非强基计划班，或者高校实施强基计划的其他专业。

（一）专家观点：强基计划强调学生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不是名校“跳板”

清华大学招办主任余潇潇介绍，志趣坚定、禀赋优异；综合评价、优中选优，是该校强基计划人才选拔的主要原则。“报考强基计划，需要真的有天赋并且真的喜爱基础学科，而不能将其当成名校‘跳板’。”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表示：“强基计划招生学校、人数大幅下降，门槛大幅提高。各校对高考分数不低于一本线的基础上，根据投放计划划定入围资格线，实际入围分数线基本都会远远高于各地一批线。即便是入围校测，难度也非常高。强基计划更重视具体学科水平与潜力，更适合学科上的尖子生。”

（二）专家观点：倒逼高中生涯教育在深度和力度上做出突破

多位专家表示，强基计划探索建立基于统一高考的多元录取制度，是教育评价体系的改革，也是高中育人方式的改革。海南中学校长马向阳表示，“强基计划将高中学生的志向、兴趣、天赋作为考核选拔的重要内容，要求学生有较高的自我认知水平和较明晰的发展规划，倒逼高中教育者在生涯教育的深度和力度上做出突破。”

（三）专家观点：多元评价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不能再认为强基计划是“降

分录取优惠”，而是多元评价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获得全国竞赛决赛金牌的学生，哪怕校测给满分，也可能因综合评分没达到强基计划录取分数而不被录取。评价一名考生的指标是多元的，但录取标准并不会因多元评价而降低。”“强基计划的录取模式使得高校需要做出定量评价，与高考分数按比例相加，从高到低公开录取。”陈志文表示，各校校测规范强调面试会根据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材料进行提问，这也再次提醒“人为包装出来的简历会露馅”。

二、如何培养：小班化、导师制、本硕博衔接培养、动态进出

与以往自主招生被诟病的“只重招生不重培养”相比，强基计划还注重“选育衔接”。目前，各校简章中都重点介绍了对强基计划所招收学生的“独特”培养方式，其中单独编班、强化交叉与通识教育、名师开小灶、本硕博衔接培养等特色鲜明。值得注意的是，多校还提出强基计划将实施阶段性考核和动态进出机制。山东大学将在学生入学后第三学年末、第四学年末和第五学年末进行3次考核与分流，通过者方可进入本研衔接、博士阶段学习；未通过者转入相应专业的普通班学习，同时从相应专业普通班中选拔相同数量的优秀学生增补进入强基计划。

（一）专家观点：强基计划既是招生改革，更是培养改革

多位专家表示，强基计划既是招生改革，更是可以撬动大学教育的培养改革。“将基础医学列入强基计划，建立本科、硕士、博士衔接的培养模式，是对基础医学高层次拔尖人才培养的重大改革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表示，“在招生上，通过改革招生录取选拔一批有志于解决重大疾病防治问题的学生。在培养上，通过科学设计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实行分阶段动态选拔培养等措施，使其成为未来生物医学和健康领域，推动疾病研究范式转变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领跑者。”

（摘编自里瑟琦科教观察 2020年5月8日，作者：lynn）

过度推崇 SSCI 论文，这股风气应当警惕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文，要求高校破除论文“SCI 至上”的现象，树立正确的评价导向。类似的现象在我国人文社科领域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即对国际期刊“SSCI 至上”。不仅一流大学的人文社科学者前仆后继争相在 SSCI 期刊上发文，而且二、三流大学也加大奖励力度，以刺激更多的教师争取在国际期刊上露脸。

辩证地看待 SSCI 在学术评价中的作用

中国高校为何如此重视 SSCI 论文，从大的方面来看，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理想追求。学者通过发表 SSCI 论文“走出去”“与国际接轨”。二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现实需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人文社科只能参考以 SSCI 论文发表为核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指标。

然而，过度重视 SSCI 的评价功能，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综合来看，主要包括：一是过分倚重 SSCI 作为人文社科成果的评价指标，容易使中国学术陷入自我矮化的困境；二是将 SSCI 作为人文社科评价标准不利于学术创新，不利于真正创造性工作的展开。三是将 SSCI 作为评价标准，会造成教师对教学投入的减少。教师发表 SSCI 论文（SSCI 期刊大多为英文期刊）无疑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此外，随着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估的兴起，世界各国政府更加强调科研成果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的现实影响力。从这个角度上，中国人文社科学者发表的大部分 SSCI 论文并没有给所处地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帮助。相反，由于语言的隔阂，国际发表反而阻碍中国民众对相关知识与信息的获取。这显然不是科学研究的初衷，也有悖于中国当下所提倡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SSCI 综合征的化解

首先，提升我国期刊的办刊水准与质量。需要承认，现在不少期刊，甚至包括部分核心期刊，存在审稿不严、选文不规范以及论文发表“走后门”等问题。从而让人产生国际期刊/论文质量高，我国期刊/论文质量低的印象，进而驱使些学者走向国际发表之路。要改变这种状况，我国期刊应借鉴国际成熟的办刊经验，组建专业的刊物管理队伍与评审专家库、规范审稿制度，坚决杜绝人情稿；进一步扩大优秀中文稿源，面向海外华人学者、港澳台学者征稿。

其次，完善学术评价体系。一方面，对海内外期刊一视同仁。在学术评价中，不应过度拔高 SSCI 期刊的地位与权重。另一方面，改革我国期刊分级制度。为避免高校期刊分级制度导致不少教师在权威期刊发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转而投向国际发表，应一视同仁对待我国 CSSCI 来源期刊，不再划分等级。

最后，平衡国际发表和国内发表。鉴于世界各国的学术评价日益兼顾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因而一个中国学者纯粹用外语发表，是不利于其成果在中国产生社会影响力的。因而，在职称评定、各种奖项申报过程中，应适当限定外语论文的比例。

当然，化解 SSCI 至上综合征的办法远不止上文提到的三点，笔者想着重强调的是：一、一项研究成果的评价核心是其创新水平与社会价值，不能简单地“以刊评文”；二、人文社科研究的国际化，绝不是简单的 SSCI 化，而是立足中国大地做出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研究成果，努力实现“那时候，中国学术之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目标。

（摘编自光明微教育 2020 年 4 月 29 日，作者：刘爱生）

【教师与教育】

大学教学改革新思维和新方向

关于大学教学改革,大致有宏观和微观两种思维方式。所谓宏观思维,就是从学校、社会或国家角度考虑大学教学改革,考虑影响整体或全局的理论、政策或制度问题。所谓微观思维,是一种从师生角度考虑教学改革的思维方式,所考虑的主要是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师生教学过程的具体变更问题。宏观与微观两种思维在大学教学改革中是同等重要的,但宏观思维的话语权更大,微观思维明显式微。因此,许多教学改革研究成果难以进入课程教学,为教师和学生所接受。所以,关注微观问题是必要的。本研究将从微观思维角度,更具体地从教师的角度对大学教学过程的若干要素展开分析,以探寻教学改革的新方向。

一、“一本书的大学”及其影响

“一本书的大学”就是一本教材的大学,教师只教一本教材,学生只学一本教材。以教材为本的教学可能是一种习惯。众所周知,教材是相关专家学者对某一学科和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进行整理编写的教学用书,为大学师生所采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课程教学只能采用教材作为教学用书。

教教材、学教材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教学止于教材。由于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反复学习这些基本知识,对于学生来讲,除了牢固掌握基础知识之外很少有其他收获。所以,“一本书的大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如下。

- ①学生的学习比较浅层,知识面比较狭窄。
- ②培养基础知识传承型人才。
- ③培养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可能落空。

二、课堂教学逻辑及其后果

现实地看,大学课堂教学的基本逻辑有二。第一,遵循教材章节先后

顺序组织教学。多数教师认为教材的编写逻辑与课堂教学逻辑应当完全一致。从理论上讲，教材是有用的，教材逻辑也是合理的，学生学习一门课，教师按照教材的知识体系组织教学，也就是教给了学生一个学科逻辑的知识体系。但当教师这么教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思考过学生学了这些学科知识体系后，除了能够应付考试还能干什么？

教师在教学各环节主要通过陈述讲解向学生呈现知识。教师的使命在于传授知识，学生的责任在于接受和传承知识。这样一来，课堂教学的基本逻辑就是教师把教材知识从头到尾向学生陈述讲解一遍，对于所谓的重点难点，教师还会花更多的时间为学生进行条分缕析的讲解。这种教学逻辑与现代教学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在现代教学中，知识不再是教学的全部目的，而更多地在于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

上述两种课堂教学逻辑是教师教学的基本依循。它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而深远的，主要表现如下。①学生知道了一些基础知识。②学生缺乏问题意识。③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无从培养。

三、教学改革的方向

解决大学教学的微观问题，起主导作用的是教师，教师教学行为的转变能够带动学生学的行为的更新。针对微观的大学教学改革，笔者曾经提出一套八字教学方法论，也就是四大原则，即设计、实践、合作和建构，也称 DDCC 原则（Design, Doing, Cooperation, Construction）。根据前文对课堂教学问题的分析，这里主要讨论三项任务。

1. 设计教学内容。在传统的备课中，教师往往把自己准备的教内容与学生应当学的内容等量齐观，这就有了教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的教学关系。在教学设计理念中，学生要学习的内容比教师教的内容要宽泛得多。所以，设计教学内容包括教师教的内容和学生学的内容两个方面。

教师教的内容应当少而精。课程教学中，完全照搬教材内容的教学不

是现代教学所需要的。教师的教学内容应当超越学生课前预习的内容，包括答疑解惑，提供新资料，扩展视野，训练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一般来讲，如果能做到“三教三不教”，教师教的内容就达到了设计要求。“三教三不教”的具体要求是：教学生看不懂的，凡学生一看就懂的不教；教学生找不到的，凡学生在互联网简单搜索就能找到的不教；教学生不会的，凡学生不学就会的不教。

2. 学生学的内容应当广而深。教师为学生设计的学习内容应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教材内容。多数教材内容都应当是学生自学的，只有那些重难点内容才需要由教师讲解。二是主要相关学术专著。教师可以将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列为学生的必读书目，要求学生自学。三是相关学术期刊文章。教师应当将与课程教学要求相关的期刊文章挑选出来，供学生课前广泛阅读。在设计教学内容时，教师应明确，教与学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分离的一面。从统一的角度看，教师所教必为学生所学；从分离的角度看，学生学的内容要大大超出教师所教的范围。

3. 设计教学问题。设计教学问题要从教与学两方面进行。从教的角度讲，教师应当根据人才培养目标，遵循学科知识结构，围绕所要教的知识设计一系列的问题，指导学生运用有关知识解决问题，从而达成教育的目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加快改革转型，以适应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将传授知识转换为运用知识解决问题，不仅能够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而且能使将知识融会贯通，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教学目标与培养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的要求是高度一致的。

从学的角度讲，教师应当为学生课前和课后的自主学习设计一系列问题，使学生带着问题自学。教师应当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学习的实际状况，设计难易程度不同的问题，以满足不同学习基础和水平的学生学习的需要。除此之外，还需要根据问题的目的性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引导学生

主动地开展深度学习。

4.设计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组织既包括课堂教学又包括课外学习，这里主要针对课堂教学组织。教学组织形式有很多，如讲授、答疑、实验、讨论等。不同的教学组织形式有不同的作用，对教师和学生要求也各不相同。如一般人只看到了讲授传授知识的功能，但除了传授知识，教师还可以通过讲授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兴趣、答疑解惑、旁征博引等。所以，教师要充分认识各种教学组织形式的功能，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特点，为课堂教学设计适当的教学组织形式。

为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教师要从如下几方面做好教学组织形式设计。①要进行整体设计。教师既要考虑一个课时，又要考虑一次课整体的教学活动组织。一般来讲，一次课的教学组织形式以2~4种为宜。②要做好学生在具体教学组织形式中作用的设计。教师应当设计好学生在每一种教学组织形式中应当发挥的主体作用及相应的方式方法，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自始至终进行主动学习。③要做好不同教学组织形式之间的衔接过渡设计。教师的教学设计要做到师生角色协调、师生活动协调和教学内容协调，使整个教学过程衔接过渡自然顺畅。另外，教师在课堂教学组织形式设计时，应将课内与课外结合起来，以全面实现课程教学目标。

（摘编自里瑟琦科教观察 2020 年 5 月 25 日，作者别敦荣）

大学课程中“水课”现象审视与“金课”建设进路

一流本科教育和一流人才培养，课程建设至关重要。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谈到大学生的学业负担问题时，首次提出“水课”“金课”，形容“水课”为内容陈旧、轻松易过，“金课”为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本科教育质量是大学质量提升、

内涵发展的根基所在，而课程建设是保证教育质量的关键。

一、“水课”是什么

(一)“水课”是课程在机制力量下的衍生品

为什么说“水课”是课程在机制力量下的衍生品。首先，“水课”是课程的衍生事物，而这种衍生事物是在机制力量下推动产生的。先从目前的评价机制来看，大学里，科学研究与课程教学比较，评价机制给教师的感受是科学研究的地位高过课程教学。再来看管理机制，我国大学实施的是严进宽出政策，形成了大学宽松的治学环境和求学氛围，一直以来，大学没有严格的学业淘汰机制和分流机制，抱着“快乐的大学”思想的学生依然能够通过“毕业清考”顺利毕业。从课程管理方面看，学生评教机制的不完善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变异，使得教师对课程的责任感下降，学生的课程学习效果也不理想。在这些机制力量共同作用下，逐渐从课程群中衍生出了一类特殊的课程形式，即“水课”。

(二)“水课”是利益相关者个人逐利的后果

深度挖掘“水课”，需要思考“水课”对谁是“受益者”。若要一门课程保有高“含金”量，就需要教师与教学管理者从诸多环节中，投入大量的精力。而如果教师和教学管理者把精力投入到其他方面，例如去申报课题，虽然导致“水课”生成，但从其他方面获得了收益。当教师与教学管理者在从事课程教学上和从事其他工作的投入产出比不等时，在利益驱使下，自然使他们向高产出工作方面进行投入转移，正是这些利益相关者个人逐利的共同作用，“水课”应运而生。

二、“金课”“为什么”

(一)怎样认知“金课”

淘汰“水课”、打造“金课”，首先要对“金课”的概念有清晰理解。简而言之，“金课”是指具有高质量和高价值的课程。高质量要求教师兼

具理论能力、研究能力、教学能力，熟知学科领域的最新动态，并且能够全身心投入课程教学，最终在课程内容和教学效果上表现出最高水准。高价值是指课程“以学生为中心”，课程的价值生成是以能够满足客体学生的高层级需要为准，最终实现最大效用和效益。对“金课”内涵理解了，也就清晰了“金课”的定位。“金课”的定位是一流课程，方向是瞄准服务“双一流”建设目标，聚焦建设课程高峰，打造课程的顶尖产品。“金课”的特征即为高阶性、创新性、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金课”的核心是课程内容具有深度、难度和前沿性、时代性，能够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金课”教学形式具有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这是“金课”的外延。

（二）“金课”的形态

联系“金课”提出的背景、现实和发展愿景，可以看出，“金课”应该是一流课程，如果给“金课”一个标识性标签，标签应包含“五高”，即高层级内容、高授课水准、高认定学分、高考核要求、高激励保障。一是高层级内容。“金课”的课程内容不能囿于教材，应该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双一流”建设目标指导下，“从学科知识、当代社会生活经验或学习者的经验中选择课程要素”，体现前沿性。二是高水平授课。教师能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课程设计、开发，不断以创新的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给课堂不断带来新鲜空气，激发学生兴趣，实现最佳教学效果。三是高认定学分，“金课”是“课程市场”的顶尖产品，“高学分”价格信号传递的是课程质量信息。四是高考核要求。考核是对教师和学生双方的，对教师要有跟踪监督措施和考核办法，确保课程质量过关，对学生的考核，要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体系，通过制度约束促进取得最佳学习效果。五是高激励保障。有考核就必然要有激励，应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举，“金课”教师的付出是其他课程教师付出的数倍，要给予高的研

究经费、教学经费和课时费等激励。

三、“金课”建设“怎么做”

(一)“金课”建设要有高站位和系统谋划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国家战略背景下，“金课”建设工作必须与整个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联动、同步，首先，要求我们在推动“金课”建设进程中，站位要高，不同于一般的课程建设，要充分认识“金课”建设对于“双一流”建设目标实现的重要意义，要站在高等教育全局的高度谋划、要求、推动工作。其次，在高站位和系统谋划下，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要把它贯穿在“金课”建设的始终。使命是人前进的导向，具备这样使命感的教师，更加坚定自己工作的价值，更能激发出工作的力量，不断提升自己，创造更大的价值。高站位、系统谋划和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只有这样，“金课”建设才符合国家的期望，符合为国家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要求。

(二)“金课”建设要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并用

“金课”是“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改革举措，“金课”建设要取得成效，必须把加强动力机制建设摆在第一位。深入分析“金课”建设过程中的各种关联因素，行政手段是外部推动力，行政手段可以解决教师的思想问题，并且对于“金课”建设，可以达到快速布置、快速推进的目的。但是，从“金课”的长期建设和发展来看，内生动力是“金课”发展的源泉和原动力。要用合适的经济手段把教师的需求问题解决在事前。高校可以在财政分配上给予参与“金课”建设单位与个人以倾斜，以高经济条件保障教师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来。其次，把教师在“金课”上的付出定价为“高价格”，这个“高价格”不仅体现在教师的课时费上，而且是一个与提拔晋升、增加薪酬、评优评先等都相关的“利得”，以此提高教师课程建设的热情。第三，“金课”要保持时代性、先进性，必须在工作

方法、教学方法等方面不断地创新，要建立“金课”奖励和补偿制度，鼓励“金课”创新和对研发付出给予补偿。

(三) “金课”建设要有专业化教师队伍作为人力资源保障

“金课”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是指教师具有厚重的专业知识、专业底蕴，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表现出专业道德，对“金课”具有全面、科学的认识和把握，并且与时俱进地对“金课”进行分析、总结、升华、提炼与创新。“金课”教师队伍的建设要多管齐下、持续推进。一是队伍结构构建与梯队培养。“金课”教师队伍需考虑功能匹配和优势发挥，构建科学合理的队伍结构，同时兼顾传帮带，注重“金课”教师梯队队伍储备和培养。二是要加强示范培训。“金课”必须不断积累不断丰富，保持不断创新，通过示范培训，从道德情操、专业水平、教学能力、教学创新、信息素养等方面，培训教师“金课”胜任力。三是要搭建平台。要定期召开“金课”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座谈研讨会等，为“金课”教师开展理论研究、提升理论素养创造机会，并设立专项课题，提供经费支持和保障。四是要加强产教融合。采取有效措施，组织“金课”教师参加产业实践、学习考察等活动，不断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四) “金课”建设要构建质量保障体系

“金课”建设要规范、长效发展，就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质量保障体系，加强“金课”科学化的评价标准建设，构建稳定的长效机制。质量保障体系蕴含着两方面内容，其一是质量标准体系，其二是质量管理体系。建立“金课”质量标准应当以“新时代高教四十条”为指导，从大学实际出发，制定出客观、科学的标准。不同类别课程有差异，但原则是共同的遵循，应把握几条原则：一是导向性原则，即确立的质量标准必须与“双一流”建设最终目标一致。二是科学性原则，即“金课”质量标准要能全面地反映大学“金课”的质量状态。三是操作性原则，即所确立质量

标准要适度，能有效地执行操作。质量标准要能够把握观测内容的实质，抓住观测点的关键，不仅能够定性分析，也能够定量分析。质量管理体系包括“金课”建设过程中质量管控措施和质量管理制度机制等。针对不同环节，要推出务实管用的举措，并以制度来保障实施。持续健全“金课”管理的工作机制，不断优化制度体系、完善制度内容，确保制度相互衔接。要自检自控与外部督查相结合，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制度执行到位。通过制度建设有力推动“金课”质量管理体系中各种关系的优化组合、协调运转。

四、“金课”建设进路——以线上“金课”建设为例

线上“金课”是所有微课、慕课等网络课程的示范和引领，线上“金课”建设的出发点是立足国家层面，推广优质教育资源，利用互联网使不同地区都可以获得优质学习资源，解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教育水平存在差异等问题，促进教育公平。而线下“金课”、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虚拟仿真“金课”和社会实践“金课”都需要结合某个大学的具体实际，不同大学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异，所以在具体课程建设过程中，要因校而异，必须要有立足大学自身的考量。首先，进行线上“金课”建设前，需要深入分析线上课程的特征，做到有的放矢。线上课程基本是“互联网+课程”形式，是融入信息化技术制作的网络课程。针对线上课程“互联网+课程”的形式及其特征，建设线上“金课”，必然从“互联网”和“课程”两个方面着手。其一，“互联网”方面，实际就是平台建设问题。着眼当前，承载线上“金课”的平台要解决的是提升便捷性、互动性和有效进行学习效果跟踪等主要问题。其二，“课程”方面，也就是课程建设。首先要明确课程的定位和课程的价值，进而分析课程建设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深入而全面地研究后，才能梳理出建课思路。从外部环境看，线上“金课”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线上“金课”公开接受学习者的评价，面临互

联网的开放性、连通性、无国界等特点可能带来的风险。从内部环境看，要深入分析课程本身的要素，把握好课程建设的关键环节，主要需抓住这样几个关键环节：授课对象、课程价值、课程开发、课程资源、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管理、课程评价，围绕解决好每个环节中的具体问题，把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建设具有高阶性、时代性和前沿性的课程等一系列目标细化到具体内容上。

除此之外，线上“金课”要贴近学生的学习习惯。线上“金课”要对学生树立良好学习习惯方面给予引导，并提供线上辅助学习服务，这样，才能够保证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消化理解和有效吸收，最终实现把线上“金课”建设成为能力培养型课程的目标。

五、结语

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离不开一流教师、一流课程和一流学生。加快振兴本科教育，打造一流课程，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一流人才，迫在眉睫。“金课”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和模式，不能盲目攀高或照搬，要遵循学科内部逻辑和规律，联系实际，不断总结、探索、实践、创新，课程建设之路任重道远。

（摘编自《中国电化教育》 2020年4月，作者：邓忠波）

【国际动态】

德国“卓越计划”对“双一流”建设机制的镜鉴

为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2005年德国政府启动了“卓越计划”，随着2019年第三阶段“卓越大学战略”遴选结果的公布，德国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建设迈入了新的阶段。“卓越计划”在动态调整机制、整合科

研体系、科研论文发表、世界大学排名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改变并影响了德国的教育制度、科学和创新体系。2020年是我国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开局之年，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德国“卓越计划”建设进展，以期为我国“双一流”建设提供经验参考。

一、“卓越计划”实施背景与最新动向

2005年，德国联邦政府和16个州政府共同决定实施“卓越计划”，计划由德国德国研究基金会和德国科学与人文委员会共同实施，相关经费由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分别担负75%和25%。计划实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2011年、第二阶段2012~2017年和第三阶段2019~2025年。

（一）“卓越计划”的实施背景

德国高等教育因其地方分治主义、法律法规、资助体系等传统，均质化特征突出，表现为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较高，但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简称THE）和《QS世界大学排名》（简称QS）等主要大学综合排名中相对靠后。强调平等和要求同等质量的教育使德国高等教育保持了整体较高的办学水平，但随着“二战”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从德国转向美国，德国大学在相关世界顶尖大学的排名中难觅身影。因此，德国政界和学界广泛讨论了如何加强德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科研能力，并达成共识。在此背景之下，2005年德国政府宣布施行“卓越计划”，通过人才培养、学科研究和国际竞争三条主线推进德国一流研究型大学建设。

1. 人才培养

“卓越计划”提出的第一条资助主线为“研究生院计划”。计划主要通过提供研究环境和研究平台，培养优秀的博士研究生。这一计划占“卓越计划”总经费的10%。但是，“研究生院计划”资助的博士生其学术研

究刚刚起步，与“卓越计划”设定的前沿学科研究目标不符，因此第三阶段“卓越计划”取消了“研究生院计划”的资助。

2. 前沿研究

“卓越计划”实施的第二条资助主线为“卓越集群计划”。计划通过交叉学科和与校外研究机构和企业伙伴进行合作，开展影响未来的科学研究。这一计划占“卓越计划”总经费的60%。

3. 国际竞争

“卓越计划”实施的第三条资助主线是“大学未来战略”，该战略在第三阶段更名为“卓越大学战略”。这一计划占“卓越计划”总经费的30%；此外，为加强教学在“卓越计划”中的分量，第二阶段将教学元素纳入其中，以研究为导向兼顾教学的申请得到了优先考量。

(二) “卓越计划”的最新动向

第一阶段的“卓越计划”于2005~2011年实施，共28所大学的85个项目得到资助，每年共获得3.8亿欧元资助，“卓越计划”，资助总额为19亿欧元。第二阶段的于2012~2017年实施，共有44所大学的99个项目得到资助，每年共获得5.4亿欧元资助，资助总额为27亿欧元。

最新的“卓越计划”，即计划的第三阶段于2019~2025年实施，做了一些政策调整。首先，取消了“研究生院计划”，并决定将“大学未来战略”更名为“卓越大学战略”。此举进一步改变了德国高等教育体系均质化的格局，反对者担忧德国高等教育体系将从此两极分化，造成卓越大学的阶层固化，未入选“卓越大学战略”的高校将在前沿领域研究逐步边缘化。其次，第三阶段“卓越计划”资助周期从原来的5年扩大至7年，如果7年后通过项目评审，资助可再延长7年。截至目前，有6所高校连续入选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期“卓越大学战略”资助，它们是慕尼黑工业大学、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亚琛工业大学、康斯坦茨大学

和柏林自由大学（柏林大学联盟）。

第三阶段“卓越计划”到期之后，2026年将开展第四阶段的资助。德国政府表示第四期卓越大学或许将在现有的10+1基础上，额外增加4所卓越大学或卓越大学联盟，即卓越大学总数可能增加到15所。

二、“卓越计划”的建设成效与主要不足

（一）建设成效

2015年，德国政府决定委托由来自奥地利、德国、瑞士的10名资深学者组成国际评审专家委员会对“卓越计划”前两阶段的实施情况开展综合评价。IEKE从大学分化、大学治理、学生数量和教学质量、科研后备人才、大学在科研体系中的融合以及国际化共6个维度对计划实施前后进行了对比，并于2016年1月发布了评估报告。以下部分是在托格·穆勒评估报告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其他研究做出的相关成效分析。

1.打破均衡主义

德国属于联邦制国家，长期以来坚持高等教育平等的原则，全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较高，区别主要体现在办学历史、学科特色、规模大小等方面，而不是教育水平的高低。这一均衡主义传统导致德国大学很难集中力量和资源培养类似哈佛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卓越计划”的实施引入了竞争，通过政府资助使得资源得以分化，特别是第三阶段将“大学未来战略”更名为“卓越大学战略”，使获得资助的德国大学其社会知名度、国际影响力、师生吸引力等得到了极大提升。

“卓越计划”的优胜劣汰机制极大培养了大学之间的竞争意识。正如评估报告所言，“卓越计划”改变了德国大学的文化，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油然而生，“卓越计划”带来的等级分化、退出机制对德国高等教育制度带来的深远影响将不断显现。

2.改变分离的科研体系

德国的科研体系主要由大学、非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研发部门三部分组成。尽管德国大学与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等著名的研究机构早已开展了各类合作，但 20 世纪 90 年代末，德国就已经发现高校和企业研发部门各自分离的问题。“卓越计划”规定非高校人员可以和大学人员享受同等的资助条件，使得两者之间的合作在领域和规模上比以往更加紧密。此外，“卓越集群计划”提倡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并鼓励大学与校外科研机构联合申请，打破了制度壁垒。

3.科研成果显著增长

“卓越计划”的核心思想或主要抓手是通过提升一流的学科研究，产生一流的学术成果，打造引领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学，重塑德国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界的领先地位。计划实施十多年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预期的成效。2015 年，托格·穆勒等研究人员基于网络数据和卓越集群认定的 25 种出版物，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方式，对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论文发表进行了分析，发现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论文发表量和论文发表影响均在上升。正如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前主席迪特尔·恩波顿所言，“卓越计划”成功开启了德国大学结构变革的进程，让德国高等教育体系步入正确的轨道。

4.世界排名有所提升

通过对比“卓越计划”实施的三个关键节点 2005 年、2012 年和 2017 年的数据发现，在 THE 和 QS 排名上，德国位列世界前 200 强的高水平大学数量有了明显增加。总体而言，世界前 200 强的增长率达到 144%。上榜的大学中，除 2017 年 THE 排名第 197 位的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没能获得“卓越计划”任何项目资助外，其余上榜大学均获资助。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卓越计划”的实施对提升德国高水平大学的排名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主要不足

在成绩显著的同时，“卓越计划”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投入经费不足，均摊到研究生院、卓越集群、卓越大学等3种资助计划之后，其经费则相当有限，在短短十年之内打造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难度很大。

三、“双一流”建设需解决的若干机制问题

经过十多年的实施，“卓越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德国发展高等教育雄心勃勃的目标，截至2017年德国大学国际排名最高的慕尼黑大学也仅位于THE大学排行榜的第30名，距离打造德国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不可否认“卓越计划”对德国大学之间的竞争和分化产生了实质而深远的影响，分析和研究其世界高水平大学建设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对我国正在实施的“双一流”建设具有参考作用。结合德国的“卓越计划”实施情况，我国的“双一流”建设需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设定科学且可操作的退出机制

“卓越计划”坚持分期实施，动态选拔，不简单延续前期资助，执行严格的退出机制。这种非封闭的可进可出的竞争机制，不仅为许多未入围的高校提供了公平参与的机会，也鞭策已获资助的院校不断创新、提升自身实力，激发了德国大学源源不断的内生发展动力，对德国高等教育体系带来巨大改变和深远影响。

与“卓越计划”相似，我国“双一流”建设坚持竞争开放、动态调整，以每5年为1个周期，采用可上可下的退出机制，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过去“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入选高校身份固化问题，以及圈子的封闭带来的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但是，原“985工程”大学全部入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985工程”之外的其他“211工程”大学也全部进入“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可见，“双一流”建设并没

能完全改变高校长期存在的身份固化问题，长此以往无法激发已入选高校的危机意识和竞争活力。尽管 2017 年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提出“打破身份固化，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但是，该实施办法并没有设定明确的退出机制，这将给实施带来盲区。只有采取灵活开放、进退得当、动态调整和易于操作的退出机制，才能真正保证“双一流”建设这一国家战略部署得到落实。

（二）积极引入第三方机构的参与

“卓越计划”由联邦教育和科研部授权非政府机构的德国研究基金会和德国科学与人文委员会组织实施，通过评选委员会的方式开展遴选。其中，德国研究基金会负责组织专家委员会、德国科学与人文委员会负责组织战略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的专家共同组成联合委员会。专家委员会负责“研究生院计划”与“卓越集群计划”的初选，战略委员会负责“大学未来战略”以及第三期“卓越大学战略”的初选。在此基础上，联合委员会提出拟资助项目名单，最后再经由联合委员会、各州科研部部长和联邦教育和科研部部长组成的资助委员会做出最终资助决定。

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因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政府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起着主导作用。“双一流”建设依然由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负责顶层设计、宏观布局、统筹协调、经费投入等重要事项决策，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负责规划部署、推进实施、监督管理等工作，日常工作由教育部承担。尽管“双一流”建设前期遴选认定阶段，设立了由政府有关部门、高校、科研机构、行业组织人员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并根据认定标准，遴选产生 137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议名单，但专家委员部门、机构、学者和专家的代表比例以及如何遴选代表等并未对外公开。“双一流”建设是国家意志一种体现，但在实施过程中如何解决政府“越位”的现象，弱化政府微观管理职能、给予高校更多办学自主权，需要合理划分

高等教育的管、办、评问题，引入相对独立、社会各界和国际同行参与的第三方机构，这也将有助于防止高校通过“寻租”的方式获得资源。

（三）设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评价指标体系

“卓越计划”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成效需要通过一个易于操作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基于“研究生院计划”“卓越集群计划”和“卓越大学战略”的建设目标，“卓越计划”设置了各有侧重的考核标准。例如，“卓越集群计划”从研究、人员和构架3个方面对受该计划资助的项目进行评价。

“双一流”建设同样需要一个可以操作的衡量标准。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须有中国特色，这是“双一流”建设的根本前提。因此，评价指标体系必须体现中国历史、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情况，指引大学与学科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和特色化发展，避免我国重点大学和学科建设出现同质化趋势。此外，“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是世界一流，因此评价体系可以部分参考“卓越计划”。正如教育部原副部长杜玉波所说：“‘双一流’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坐标系，不能‘自说自话’。”此外，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还需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同一标准问题。我国有290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办学历史、办学特色、办学定位等大相径庭，需要建立一套符合不同学科类型的科学而合理的评价体系。二是平衡教学与科研问题。目前，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对高等教育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这就造成职称晋升、薪资水平等过于偏重科研指标，但教学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因此，我国高校应改变过于偏重科研，忽视教学的现状。

（摘编自《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作者：吕勇）

美国本科生科研核心能力图景、培育路径及其启示¹

1998年，博耶报告《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蓝图》的出台，使得本科生科研在美国得到普遍推广，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运动潮流”。历经数十载的发展，美国本科生科研能力培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美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一、美国本科生科研核心能力图景

鉴于科学研究的高难度和复杂性，往往需要个体拥有多重能力组合。美国学院与大学联合会作为本科教育领域主要的全国性组织之一，构建了现代大学生“核心学习成果”框架，并将其所含能力视为通往卓越的必备素质，为本科生核心能力发展提供了一套全新思路。

（一）发现问题的能力

爱因斯坦和菲尔德曾指出，发现和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如何培养本科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呢？美国研究型大学普遍重视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麻省理工学院几乎所有专业都开设了独立研究和特殊问题研究的讨论课程。罗格斯大学阿瑞斯蒂研究中心每年春天都会举办全校性的本科生科研研讨会，为学生提供分享研究成果的宝贵机会。学生在研讨会上以论文、作品设计、学术海报等形式，将其科研成果展现给教师、同学或社会团体成员，在多样化的交流中不断强化自身的问题意识与科研志趣。

（二）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全球高等教育公认的培养目标，是一种反省的思维，强调个体对观点、假说、论证的审慎判断；创造性思维是在已有知识基础上创造出新思想、新概念或新技术的思维活动。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是本科生科研能力的核心元素，对其将来的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哈佛大学注

¹ 原标题：美国本科生科研核心能力图景、培育路径及其启示——基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实践。

重以一种自由探究的精神进行教育，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致力于挖掘学生创新潜能与创造才能，鼓励学生批判地思考和审视知识的来源，尝试新的思维方式，去探索、挑战、创新，养成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

（三）理论写作能力

在科研工作中，论文或研究报告是研究成果的重要呈现形式。理论写作即以论文、调研报告等形式来准确描述研究过程及研究结论。对于本科生来说，理论写作能力既是内隐性的自我表达，也是外显性的人际交流所必备之技能，是其综合素质和科研能力的重要体现。美国许多研究型大学将理论写作视为本科生的必备能力，并将有关课程嵌入通识教育体系，通过写作训练帮助学生迈入科学研究与思维创新的世界。普林斯顿大学专门开设了本科生“写作研讨课”，将理论写作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系统的学术写作训练。

（四）跨学科能力

所谓跨学科能力，指个体整合和运用不同学科知识的能力。伴随知识技术迭代更新，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日趋复杂，跨学科成为应对知识增长和填补学科空白的必然选择。对现代大学来说，培养本科生的跨学科研究能力显得愈发重要。正如斯坦福大学副教务长安·艾文所言，“学科交叉点是新思想涌现和创新性研究发生之地……我们必须为学生做好准备，跨越（学科）边界的能力对于成功而言越来越重要”。为了提高学生的跨学科能力，美国研究型大学秉持卓越理念，在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大幅改革，设计了跨学科课程和研究项目。

（五）数据能力

现代社会，数据日益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重大战略资源，对各类数据的快速获取、敏锐判断和充分利用的能力已成为人们今后发展和科学长足

进步的重要推力。美国普渡大学的卡尔森教授认为，数据能力包括“了解数据库和数据格式，发现并采集数据以及数据管理与组织、数据操作和鉴别、元数据的使用、数据保存和再利用、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数据伦理与引用规范等”。美国不少研究型大学均将数据能力视为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积极制定数据能力培养策略，以融入学科的数据能力教育为支撑，致力于学生数据能力的提升。本科生科研核心能力培育与研究型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高度契合，是发展大学生创新能力与科学素养、提升大学综合实力的有效途径。

二、美国本科生科研核心能力培育路径

本科生科研是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一个重要侧面，从20世纪初的早期萌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科研训练机制，其培养路径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融入研究元素的课程设置

美国研究型大学在课程选择、组织、设计上突出强调课程的研究性质，专门为本科生开设研究型课程，即在课程中融入“研究元素”，让所有学生都能了解从事科研的必要知识，提升必要的科研技能与素养。斯坦福大学为新生开设了“斯坦福入门”，课程具有鲜明的引导性，旨在启迪研究思维，激发学生对学科的兴趣，回应新知识发展和科研需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可迁移思维能力。导师除了指导本科生循序渐进地开展项目研究外，还会向学生传授必备的科研技能，如口头汇报、实验设计、论文撰写和研究工具使用等。

（二）贯穿全程的个性化指导

美国研究型大学高度重视导师在本科生科研活动中的作用，以师生双方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项目为纽带，为本科生提供专门的、贯穿全程的个性化研究指导。如哈佛大学的导师制创造了一种全方位、全时空、全过程的

教育，确保每一位学生都可得到关注和了解，并安排了专业领域的研究导师加强对本科生的科研指导。至于如何确定研究导师，哈佛大学也为本科生提供了多元的途径。学生可以咨询本科生研究计划办公室的相关老师，或是通过各门课程、学术讲座以及其他形式与导师接触并建立联系。导师作为学科研究领域的专家，帮助本科生完善研究计划，指导其研究思路和方法，或通过自身的研究项目为学生提供资助。

（三）弹性多元的科研活动选择空间

美国研究型大学非常关注学生的科研兴趣，在项目的研究方向、研究内容、时间安排等方面都进行精心设计和优化。本科生研究项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即科研学徒制项目；另一类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即独立立项制项目。通常前者更为常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科研学徒计划”、罗格斯大学的“研究助理项目”等便是此类。本科生科研时间安排，可分为学年或学期研究计划和暑期研究计划两类。美国许多研究型大学都设立了本科生暑期研究计划。

（四）卓越的本科生科研管理机制

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科研管理体系不仅重视科研过程，也致力于追求卓越结果。其科研管理机构的设置与建设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以更加科学、规范的方式对本科生科研活动进行管理。第二，建立科研激励制度，为本科生科研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和经费保障。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能够获得相应的学分、补助和奖学金，同时参与科研训练也是获得荣誉学士学位的基本条件。第三，建立科研成果的评估机制，帮助师生和管理者对项目实施过程反思。不少美国研究型大学搭建本科生科研成果展示平台，为学生提供展示自身研究发现、与他人进行交流的机会，促进其科研核心能力发展。

（五）多方合力的科研资源支持

美国联邦政府、民间机构以及学术组织等都十分重视本科生的科研活动，为本科生科研提供了一系列资源支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等联邦政府机构每年都会向研究型大学提供数十亿美元的研究经费，以推动工程学、生物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众多领域的知识创新。除支持研究与开发以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还支持本科生教育，提供科学与工程本科生奖学金及研究助理津贴。就民间机构而言，本科生科研理事会、美国博耶委员会作为两大全国性民间教育组织，对本科生科研影响最为广泛。全美本科生科研大会则把全国的本科生科研结成一个整体，使得各个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科研活动形成合力，更好地促进了本科生科研核心能力的增长。

可见，美国研究型大学在本科生科研核心能力培育过程中依靠以上培育路径的相互配合、齐头并进，从而使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科研培育举措能够真正在理念上引领学生，在内容和形式上吸引学生，在制度上服务学生，在实践中指导学生。

三、美国大学教育实践的启示

通过梳理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科研核心能力框架及其科研核心能力培育路径，可以展望未来研究型大学本科科研核心能力培养体系改革的未来趋势。

（一）回归大学之道，反思过于功利的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大学之道的第一要义便是育人，人才培养是一切大学教育活动的价值旨归。反思当下一些高校的本科人才培养体系，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过于关注经济指标与社会现实，而忽视人的核心素养；在人才培养规格方面，过于强调专业技能与就业能力，而忽视人文精神与科研能力培养。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指出，若经济动机成为“象牙塔”教育的主题，

将导致大学失去其根本的教育宗旨及与社会的联系，只能是“失去灵魂的卓越”。因此，大学必须从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着手，深化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化解本科教育功利化困境。我们可借鉴美国研究型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经验，通过加强本科生科研参与、实施个性化教学以及制定基于项目研究、开放课程教学的方法，促进学生科研核心能力发展，培养引领未来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

（二）构建全面融入科研元素的课程框架

大学课程的使命在于引导学生主动地探究知识，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学生能够适应一个全然不同的未来世界。具体任务是：第一，制定本科生科研核心能力发展框架，以制度性安排确保本科生科研核心能力的培养。第二，加强通识教育课程建设，促进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共同发展。设立专门的通识教育管理与指导机构，负责通识教育课程资源整合、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衔接与融合等事务。同时，在课程结构调整时，提高对通识课程的重视程度，设计“四年一贯制”的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体系，形成通识教育促进专业理解、专业教育促进通识教育发展的良性循环。第三，建立研究型课程教学范式。倡导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发挥启发、组织、激励之作用，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实践，在研讨中创造性地发现和解决问题，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必要的科研核心能力基础。

（三）制定个性化的本科修读方案

学生构成和发展取向日益多元，构建个性化本科修读方案，是培养本科生科研核心能力的关键途径。为此，有必要对本科修读方案进行变革。首先，要树立新理念，凸显个性化培养与科研核心能力培养。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培养理念不但体现了对本科生科研核心能力的重视，且个性鲜明。所以我们应着眼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确立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理念，

实现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结合。其次，要重构课程体系，注重课程设置的挑战性和创新性。全面推进由“新生研讨课程、通识教育课程、科研实践课程”构成的三层次本科生科研训练课程体系建设，推广研究型教学理念与模式，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同时，要注重发挥第二课堂育人功能，组织开展探究性学习、实验室研究、独立项目研究、跨校学习或海外交流等多种形式的科研学术活动，增强第二课堂学术育人效果。再次，要进一步完善学分制，增加高质量选修课程门数，适当提高选修学分及个性化科研学分比例，给予学生充分的选课自由，为他们提供多样化的科研能力训练与学术成长空间。

（四）打造高水平“教学与科研指导共同体”

打造“教学与科研指导共同体”，需要实现几个重要转变：其一，实现“单一指导”向“团队合作指导”转变。构建高水平“教学与科研指导共同体”，由单一导师指导转向共同体指导，必须在教师之间培育一致的学术信念，以共同愿景为导向，在互助、互信的基础上形成教师群体的理解与合作，协同参与本科生科研行动。其二，促进“单一学科培养”向“多学科交叉、融合培养”转变。学校要构建理工协同、文理渗透的指导团队，促进本科生科研多学科集成创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科研核心能力。其三，推动“接受式学习”向“研究性学习”转变。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教师要积极组织各类研究活动，帮助学生逐步形成善于发现、敢于质疑、勤于探索的心理品质，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

（五）搭建、整合并开放本科生科研训练平台

与美国研究型大学相比，我国很多高校在科研训练平台建设的主体、开放性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等方面尚存在较大差距。无论从项目建设主体看，还是从本科生科研项目和经费来源看，我国政府和高校几乎承担了全部责任，科研平台建设主体相对单一，汇聚优质社会资源的能力也明显不

足。美国高校则通过与联邦政府、私人企业、各类基金会等社会资源合作，为学生开展研究提供了大量项目和资金支持。因此，应借鉴美国经验，积极引进、整合优质社会资源，动员各类社会资源支持本科生科研与学术发展，打造联结政府、高校与社会资源的实践平台是当务之急；同时，要增强校内科研平台的开放性，在科研训练中强化校际合作，发挥不同高校的优势特长，打造跨院校本科生科研实践平台；而且要拓展、整合国际资源，推进本科生科研训练平台国际化，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六）强化本科生科研过程管理与绩效考评

科研管理和绩效考评是规范本科生科研过程管理、提高本科生核心科研能力、促进科研成果产出和质量提升的必要前提。对本科生科研过程的管理，首要任务是成立服务于本科生科研的专门机构，负责本科生科研的组织、协调、管理与服务等事宜。其次，要针对科研过程各个环节，如问题意识培养、研究选题、研究设计、研究报告、成果展示等，建立阶段性检查考核系统，促进本科生项目研究训练向高层次科研能力提升迈进。再次，要通过评价对本科生科研表现进行衡量、评审，进而揭示其研究成果价值。要优化考核方法，以定性评价为基础，以量化评价为辅助，坚持两者有机结合，避免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

综上，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科研训练作为一种融教学与研究为一体的育人形式，为大学科学研究职能的发挥和学术创新奠定了制度性基石，造就了一批批科研能力拔尖、学术水平出众的高素质人才。美国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并须努力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本科生科研核心能力培育道路。

（摘编自《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作者：许祥云、张茜）

大学治理：美国、欧洲、中国

近年来中国大学的发展速度很快，比如办学资金有了很大改善，人才培养方式也正在改变。而大学管理体制，包括大学治理问题，仍是困扰中国大学，特别是顶尖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制约因素。大学治理改革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一、大学治理的美国模式

美国高等教育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都很成功，二是大学教育的普及性和尖端性都很好。本文只讨论研究型大学，包括私立和公立。

下面从六个维度来刻画美国大学的治理模式中最重要的一些特征。

第一，大学自主权。在美国，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校董会是大学的法人机构。校董会不仅在法律上是独立的，而且在实际运行中也是独立的，即使是在公立大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公立大学除军校以外都不是国立(即联邦)大学，主要的公立大学是州立的，还有为数众多的“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是州政府和州以下政府出资建的。因此，公立大学之间的竞争是公平的，没有特殊的公立大学。

第二，大学管理者的挑选与任命。大学校长是由校董会参考遴选委员会意见任命的，校长和他(她)所领导的大学管理层对校董会负责。大学校长会使用同样的方式任命教务长、副校长和院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都不是由教师、职员、或学生、校友民主选举产生的。这就避免了大学的管理者为了讨好在职的教师、职员、学生和校友，而放弃推动那些不受欢迎，但又十分必要的改革和结构调整。

第三，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美国大学内部的行政事务是由管理者负责，即“校长治校”或“管理者治校”。教师并不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教师只参与学术相关的决策，比如课程和培养方案的设计、教师聘用和职

称提升等。但是，即使是有关教师聘用和提升的决策，教授会也只是向院长和校长“推荐”，最终决定权仍在院长、教务长和校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大学的体制是“教师治学”，而不是“教师治校”。

第四，教师的挑选、待遇和流动。主要研究型大学教师的挑选范围是全球性的。教师挑选的原则不是在一个学院中不同领域同时申请提职称教师之间的比较，而是在同一领域内全球范围内的比较。教师的薪酬待遇是由学院和大学自主决定的，不受政府管制。因此教师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教师的薪酬待遇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性。

第五，学生的挑选和流动。对研究生而言，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大学，都是在全国和全世界招收学生。对本科生而言，私立大学实际上招收的本州的学生居多。而州立大学，受经费来源限制，必须招收相当高比例的本州学生。但一州内的州立大学之间的竞争仍然激烈，伴随金融危机，越来越多的州立大学因教育经费不足，放宽了招收外州和外国学生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除了“社区学院”以外的许多学校会根据学生表现择优录取。所以，大学对学生的竞争激烈，学生的流动性大。

第六，学费确定和学校经费来源。私立大学对学费自由定价。州立大学学费按照生源地分别定价，州内学生学费较低，其中本科生学费受到较大限制，而研究生学费定价比较自由。私立大学的学费收入和捐赠是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公立大学的学费收入和政府拨款则是主要经费来源。除此之外，来自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研究经费是所有大学重要的经费来源，这些经费的获取具有竞争性。

二、大学治理的欧洲模式

世界上最早的大学都出在欧洲，美国的大学，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开始也都是学习欧洲的。况且，欧洲的人口还比美国的人口多。为什么现在欧洲的高等教育如此落后于美国？本文中所述的“欧洲模式”，

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欧洲大陆模式”，并不包括英国。

欧洲大学的治理模式在上面列举的六个维度上有如下特征。

第一，大学自主权。在欧洲，大学以公立大学为主，无论是哪一种公立大学，通常都有一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不同程度地管理大学事务。大学的自主权(预算、教师聘用、薪酬、学生挑选)虽然情况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同美国相比相当有限。受制于政府管理的垄断性和生源地限制，大学之间也缺乏竞争。

第二，大学管理者的挑选与任命。欧洲大学的校长多是选举产生的，通常是由教师、职员和学生选举产生。院长、系主任通常也是选举产生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的大学确实是很民主的，更接近于“教师治校”。这种民主产生了一些问题，它使得欧洲的大学很难创新、改革和做结构调整。

第三，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欧洲大学的教授不仅对学术，而且对学校的行政管理的影响也比美国大，称得上是“教师治校”。由于不少欧洲大学内部权力通常集中在数量很少的教授身上，实际上是“教授治校”或“资深教师治校”。这导致不少资深教师不以学术研究为主业、偏离学术前沿，但是又主导了学科布局、教师招聘等方面的决策。

第四，教师的挑选、待遇和流动。欧洲大学的教师通常是公务员，或者是比照公务员管理，包括待遇、权利等。因此他们从一进入大学工作就是终身制，没有按照学术水平决定是否获得长聘教职，没有被解雇的可能。这就大大减少了教师流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教师的薪酬又比照政府公务员，并受到政府的管制，很难具有全球的竞争力。

第五，学生的挑选与流动。在一些欧洲国家，主要的公立大学必须全收学生。学生入校没有竞争，但是学生上了大学之后有较大的淘汰率。不过欧洲各国内部的情况差异很大，英国、瑞典、西班牙等国可以挑选学生。

研究生的情况有所不同，可挑选的程度较高，但大多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模式，基本上是由资深教授决定录取，而不是竞争性的录取机制。

第六，学费确定和学校经费。在欧洲，公立大学免费，学校的经费主要靠政府财政拨款。由于政府财政困难，教育经费自然不足。这反过来又影响到教师的招聘，不仅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薪酬，而且也影响到科研经费，因此无法吸引到最好的教师。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在过去十几年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和改革力度。

三、中国大学治理现状

从上面的六个维度来分析，中国大学治理的现状特征如下。

第一，大学自主权。虽然民办大学在增多，但是迄今为止所有的研究型大学都是公办大学，其中按照重要程度又分为教育部所属（仍有少数是其他部的部属）、省属和其他。教育部作为政府主管部门仍然控制招生名额、专业设置、项目审批、学费审批、学科评估、学位审批等一系列办学日常决策。大学办学的自主权十分有限。

第二，大学管理者的选择与任命。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是由上级领导部门和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和任命的。对于“副部级”大学，书记和校长是由党中央和国务院任命的，任命过程中有“民主推荐”和征求意见的环节。选择校长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其他硬约束包括年龄、行政级别、岗位经历等，并没有候选人是否是一位教育家，是否具有教育思想等与大学教育相关的因素。

第三，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中国的大学内部管理权力主要集中在党委系统、行政系统。所以，中国的大学不是“教师治校”，这点与欧洲不同。在学术权力方面，中国在有些方面有些像欧洲，比如少数资深教授的影响力远大于其他教师。但是总体而言，除少数几所研究型大学外，在中国大学中教师的学术权力很小，党委系统和行政系统的学术权力很大。

第四，教师的挑选、待遇与流动。大学教师仍然按照国家“事业编制”人员管理，现金工资较低。除此之外，收入还包括国家固定教师补贴以及来自院系教学项目的课时费和教师科研项目的提成。整体而言，中国教师收入的灵活性比欧洲一些国家要大。此外中国的大学挑选本校毕业生留校做教师的倾向严重。在绝大多数大学，副教授仍然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很难流动。目前在一些院系，新聘用的教师开始可以流动，教师市场正在形成。特别是大学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其程度超过欧洲。

第五，学生的挑选与流动。对本科生而言，学生必须经过全国统一的“高考”才能被大学录取，大学间争夺优秀学生激烈。由于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和招生政策倾斜，一些原来全国性的大学变得越来越“本地化”了，影响了学生的流动性。研究生入学也要经过考试和激烈的竞争。在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式和录取方式上，欧洲式的“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仍然是主流。但是在一些专业硕士学位的录取方式上，美国式的方式(即由项目统一录取，与教授无关)占主流。

第六，学费确定和学校经费。公办大学本科生基本免费，公办大学学术型研究生也基本免费。但是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中的所谓“独立学院”可以不受此限制而收取较高的学费。另一方面，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学费定价则比较灵活，但是需要向政府主管部门备案。整体来说，中国大学，特别是主要研究型大学的经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有较大和较快的增长。这种增长在不同学科领域很不同，经费来源也不一样。除了国家支持的用于发展学科的“211”和“985”经费外，经费来源还包括学费、科研项目经费。

从以上的六个维度的分析来看，中国大学治理的现状，与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相比较，大致是介于两者之间。中国与欧洲相似的是，政府对大学的干预都很强，不同的是中国大学还受各级党委的领导。

四、中国大学治理的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竞争。欧洲、亚洲各个国家也都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自己的国家战略，采取了很多举措。面对这种竞争，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确定目标、增加经费之后，大学治理改革就显得更为关键。

本文提出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大学治理基本框架的16个字：“办学自主、政校分开、教师治学、校长治校”，供学术讨论。

第一，“办学自主”。“办学自主”的目的是让大学从政府权力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所说的“去行政化”的真正内涵。大学的首要问题是界定政府与大学的边界，使得大学具有不受政府任意干预的办学自主权。“办学自主”并非“大学自治”。“大学自治”不是一种合适的提法，因为“自治”是一种封闭式的治理方式。一方面，大学是社会中的一个组织，社会一定对大学有影响，而大学也应该对社会负责任。另一方面，大学的管理者不应只对大学内部人员负责，这些人未必总代表大学的长远利益。所以大学办学应该“自主”，但不应该“自治”。

第二，“政校分开”。政校分开的制度保障是大学建立社团法人治理，即成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校董会”或“理事会”，并由此确定大学与政府的距离。校董会是社团法人治理结构，这在世界各国的公立大学都已经成为惯例。校董会的组成、当选方式等需要具体研究，建立规则。可以预见的是，不同类型的大学校董会的组成是不一样的，不应有统一的公式。在“政校分开”后，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大学的职责应以宏观指导为主，而不再干预大学办学和微观管理过程。因此，政府职能转化是“政校分开”的重要前提。

第三，“教师治学”。“教师治学”是指教师应发挥在学术治理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这里的教师是包括所有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教师，不仅是正

教授或资深教师，也包括年轻教师，他们活跃在研究前沿，是未来的学术骨干。教师治学的内容包括各教学项目的培养目标和方案的设计，学生学业水平的核准，教师聘用和职称晋升学术标准的制定等学术问题。当然，教师治学还包括捍卫学术自由。但是“教师治学”的内容不应该包括学科设置、院系设置、教学研究等资源配置这些属于行政管理的问题。

第四，“校长治校”。“校长治校”的含义是校长应该是大学的“首席执行官”。在实践中，往往是由校长和其他校领导一起组成执行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对重大行政管理问题作出决策。因此“校长治校”并不是校长一人说了算。如果校长(类似地院长)经选举产生，他们就不得不顾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这对大学，特别对转型期的大学，尤为致命。在现任教师中实行民主票决，不一定符合学校的长远利益，因为这些人往往代表所在学科过去和当前，既不能代表学科的未来，也不能代表学生、校友、未来教师等利益相关者。

(摘编自高教研究前沿 2020年4月15日，作者：钱颖一)

【同类高校】

中国人民大学获10项“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

近日，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组织公开招标的“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布，中国人民大学获得4项重大项目，6项重点项目。

此次重大项目主要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对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思想新

观点新论断进行深入研究阐释。此次中国人民大学获取 10 项重大、重点项目，既是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综合科研实力的集中体现，又将推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阐释取得新的突破。

（摘编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网 5 月 22 日）

上海财经大学入选首批国家经济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 2019 年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名单，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入选。2018 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2019—2021 年，分年度在理科、文科和医科共建 260 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其中文科基地（含哲学、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60 个。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以经济学院为依托，汇聚全校优质资源，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人文情怀、世界胸怀，能够勇攀世界科学高峰、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未来经济学家。一直以来，经济学院依托“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和“经济学创新人才培养试验区”等平台，积极以“追求长远卓越、打造世界一流、服务国家社会”为综合教改方向，围绕“聚一流师资、汇一流学生、设一流课程、育一流人才”基本改革方针，实行了全方位经济学教育综合改革，形成了一整套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学教育教学模式，为基地建设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后学校将坚持立德树人，深入探索选才鉴才机制，变革人才培养模式，开展书院制、导师制、学分制“三制”改革，加强育人成效评价，努力将基地建设成为国家经济学一流人才培养的高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体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战略力量。

(摘编自上海财经大学新闻网 9 月 10 日)

【本校动态】

携“宝典”走四方——我校法学院学者积极宣传民法典

自 5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颁布以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的专家学者们第一时间对《民法典》展开了研究并通过开办讲座、主题报告、学术沙龙、媒体发声等多种渠道向大众解读,帮人民群众深入理解这部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规定的“宝典”。

近日,湖北省已成立由 33 名法学专家教授组成的民法典普法宣讲团,宣讲团由省司法厅副厅长、我校法学院刘嗣元教授任团长,成员包括法学院吴汉东教授、徐涤宇教授、温世扬教授、麻昌华教授、张家勇教授,李俊副教授、陆剑副教授、胡东海副教授、唐义虎副教授、刘征峰副教授,他们与其他众多学者一起,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

著名知识产权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资深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吴汉东教授,在 6 月 19 日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提问时,肯定了民法典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对未来知识产权的发展给出具体意见。6 月 11 日,湖北省委政法委组织开展《民法典》专题学习,法学院院长徐涤宇教授作《民法典的中国特色和时代意义》专题讲座。6 月 16 日下午,徐教授在长沙市委政法委、市法学会主办,长沙市律师协会承办的“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之民法典专场报告会上做主题

报告。另外，徐教授还受邀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建设银行以及武汉市公安局等多家单位开展了主题讲座。

5月30日，在湖北经视频道播出的《经视说法》节目中，温教授论述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意义。6月10日上午，温教授向武昌区党政领导及人大代表宣讲《民法典》；17日下午为襄阳市委中心学习组解读《民法典》；23日下午为河南漯河市委中心学习组讲解《民法典》。

6月24日，湖北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法学院麻昌华教授受邀前往华能风电公司开办讲座，详细解读《民法典》。6月19日，仙桃市检察院举办“仙检大讲堂”第三讲暨检委会（扩大）集中学习，法学院副院长肖志远副教授受邀对《民法典》进行专题解读。6月18日下午，伍治良副教授应邀前往湖北省军区第十七干休所，为5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将军、50余名现役军人及文职军人做《民法典新规定新精神》公益讲座，并在讲座结束后逐一回答了众人关心的老年人财产继承、婚前购房婚后还贷等日常民事问题。

6月27日，法学院刘征峰副教授在同人法律传媒青律营主办的首个专注于民法典婚姻编的线上沙龙中讲述了民法典婚姻编部分内容。此外，他还受邀参加了湖北广播电台湖北之声的民法典系列访谈。7月3日与8月14日，刘征峰副教授将在盈科国际律师学院举办的“民法汇典 以编为纲-带你解读《民法典》”系列课程中授课答疑。

6月19日晚，夏昊晗老师以“《民法典》融资租赁合同规则的新变化”为主题举办了一场线上公益讲座，帮助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了解《民法典》中具体规则的变化。7月10日与7月17日，夏老师还将参与盈科国际律师学院举办的“民法汇典 以编为纲-带你解读《民法典》”系列课程，解析民法典担保新规和融资租赁新规。此外，法学院民商法系主任陈晓敏老师也曾做客湖北经视访谈阐述对民法典的见解。7月1日，法学院陆剑副

教授将为咸宁市水利和湖泊局开展《民法典》中新制度和新规定的宣讲活动；7月2日，陆剑副教授将参与武汉电视台普法访谈类节目——《好说法》，对《民法典》中的居住权制度进行解读。

法学院众多专家学者们不仅向大众介绍了《民法典》的历史沿革、基本知识、意义价值，也在自身研究的领域上解析了《民法典》的具体内容，让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真正了解《民法典》，促进这部“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真正融入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学者们为宣传民法典奔走四方的步履仍未停歇，并且未来会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们投入到宣传中来，为普法工作奉献学识与力量。

（摘编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新闻网6月30日）

中南大.建行大学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挂牌成立

5月20日上午，建行大学湖北省分行分校、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挂牌仪式在中国建设银行武汉生产园区举行。校党委副书记、校长杨灿明，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闫平，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建行大学华中学院院长王浩，建设银行业务处理中心主任严建新，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资深经理、建行大学华中学院常务副院长李翎等出席仪式。

闫平在致辞中表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正式挂牌，标志着银校合作在既往的基础上又开新花，再结新果。中国建设银行始终以服务国家社会发展为己任，深耕银校合作、产教融合，把自身的发展与国家重大战略、社会文明进步、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紧密结合，彰显了大行胸怀和担当。深化产教融合，加强校企合作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建设是银校双方应时所需、顺势而为的重要举措。希望

双方精诚合作，努力把基地建设成银校合作的“桥梁”，以基地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拓展项目合作版图，把社会经济发展前沿与教育事业革新紧密联系起来；希望双方开放包容，努力把基地建设成金融人才培养的“摇篮”，充分挖掘中南大经、管、法学科优势，经济与法学人才培养特色，协力把新金融人才培养推向新的高度；希望双方锐意进取，建设成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新标杆”，以实训基地建设为新的起点，以更高远的战略眼光，开拓创新，努力探索，打造银校合作新典范，合力为产教融合贡献优质方案和创新智慧。

（摘编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新闻网 5 月 21 日）

主 编：高利红 曹吉安

责任编辑：黄容霞

编 辑：刘金萍 杨梦莹

报 送：教育部、教育厅相关处室

交 流：兄弟高校相关部门

呈 送：校领导、全校各单位负责人

2020年5月15日

本期共印 150 份
